



高教资讯

2016年第9期

(总第14期)

发展规划处、高教研究中心编

2016年11月28日

本期要目

- 教育部：明年实施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国家标准
- 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使大学深处危机
- 对我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的思考
- 师范院校怎么“突围”
- 大学如何走出“象牙塔”

目 录

本科教学

- 教育部：明年实施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国家标准.....1

本期视点

- 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使大学深处危机.....2
- 一场持续 20 年的教育改革试验
——对我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的思考.....8

高校科研

- 如何激发高校科研的“洪荒之力”？.....12
- 大学应重构科研与教学关系.....16

转型发展

- 师范院校怎么“突围”.....20
- 师范院校转型发展探索：教师教育是师范院校的根.....22

社会服务

- 三问高校社会服务：大学如何走出“象牙塔”.....25

政策解读

- 允许高校教师兼职 新政策将给高校带来什么变化.....29

观点速递

- 仪规消退 教育何存？.....32
- 未来教育范式在青年手中.....34

92 个本科类专业质量标准即将颁布

教育部：明年实施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国家标准

明年，我国将实施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国家标准。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 29 日在 2016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年会暨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透露，教育部将于今年年底、明年年初颁布实施全部 92 个本科专业类的教学质量标准，作为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国家标准和基本要求。

当前，人才培养被高校摆在更加重要突出的位置。林蕙青说，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再次明确，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创新。

她介绍，最近一批高校在制订“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时，把建设一流本科作为核心指标，把教育教学改革作为重要内容。一些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正在扭转，一些高校的科研优势正在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而高校新一轮综合改革方案普遍将教师评聘奖励制度改革作为重点，重中之重是增加教学权重、引导鼓励教师把精力更多地投入教书育人。此外，人才培养经费持续增加，31 个省（区、市）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全部达到 1.2 万元。高校质量保障主体意识增强，一批高校形成了人才培养工作自我诊断、自我完善工作机制。

但是，林蕙青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就全局来看，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还不够牢固，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对教学工作的重视、教师投入、资源保障还没完全到位，人才培养工作仍在爬坡过程中。

林蕙青表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学校、教师、学生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共同责任，各方都要担负起各自的使命和责任。

她以高校为例指出，高校要进一步落实人才培养核心地位。比如，当前重要

的是，高校要避免将“重视教学”“重视人才培养”泛化、抽象化。学生和老师不是符号和数字，高校要深入、具体的推进人才培养工作。此外，高校也应该对院系和教师开展教学改革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同时，要加大对学生实习的投入。

林蕙青介绍，为了完善教学管理制度，教育部制订和修订基础性教学文件，还实施一系列教改专项，推动教学改革。比如，实施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专项，国家投入资金支持若干国家发展战略急需的重点领域，推进教学改革。

同时，教育部也在积极推动教学质量评价监督：要求高校建立健全教学质量自评体系；开展对高校教学质量的审核评估；对高水平大学的工程、医学等职业性强的专业，开展专业认证，确立国际标准；支持第三方社会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校教育教学评价。比如，去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织的“学生喜爱的大学校长”评选活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每年开展的学生对学校教学工作满意度调查等。

（《中国青年报》2016年10月30日 作者：原春琳）

本期视点

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使大学深处危机

大学的学术生活正被根本性改写

大学的质量是近几十年来高等教育越来越受关注的问题——全球大学排名和各种科研评估作为质量保障的替代方式引起了政策决定者、大学管理层、学者、学生、家长乃至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这对孪生的质量评估系统被视为服务于“组织效能”“质量控制”“透明工具”“审计文化”或“问责运动”。它们被认为

由政府问责、质量认证和商业排名等合力所致，通常被用来界定优质高等教育、知识创新体系，甚至世界一流大学等。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必须关注一个关键的问题，这就是：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在如何影响不同环境下大学的使命和格局？这一疑问还衍生出如何排名、为什么排名、实质上排名什么等一系列的问题。

最近的研究文献显示了两种对比鲜明的场景。

一种是一些研究者发现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具有积极的效应。例如，排行榜和评估体系有助于“院校的质量和管理效果”。类似的结论是，全球排名给大学施压，促使其变革和建立有效的质保机制。量化指标被认为是一种透明的理性工具，对研究型大学设置“更大的目标和更高的标准”具有正面影响，促使大学参与到追求更高质量的全球竞争体制之中。

然而，与此同时，另一种在国际学术界也占据着讨论的主导位置，即认为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给大学带来了负面影响。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泰瑞·伊哥顿教授观察到，英国大学体系中存在大量的拜占庭式官僚主义——年轻教授属于苦力、校长相当于首席执行官、资深教授是高级管理人员，大学校园里，包括牛津和剑桥，弥漫着唯审计和问责是瞻的风气，似乎人文学科将在这种灾难中彻底死去。

无独有偶，东亚的大学对此也不遑多让。台湾政治大学的周祝瑛教授以“SSCI 综合征”来批评大学在名利场中乐此不疲的泛滥趋势。大阪大学石川真由美通过对日本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分析了全球排名对本土学术的威胁。她的结论是：对排行榜的运用无法解决在知识追求国际化的同时达到提升学者个人表现的真正需要，也无法确保不同年龄阶层的学者之间的公平，反而造成了英、美学术圈主导世界知识话语的趋势。最近更有拉美学者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对学者的工作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没有人能逃避“标准化”“商业化”和“同质化”等的控制。

总之，各国的大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所主导。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知识探索和转移被狭隘化为可量化的细小指标，科研成果被各种评价体系所左右。大学老师的学术生活被根本性改写，科研人员疲于应付各种量化考评，结果导致大学原有的使命被颠覆，排行榜和评估指标被奉为圭臬。

全球排名、科研评估如何影响大学

——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日本和美国的案例比较

运用目的性抽样策略，课题组确定了中国内地（TCU）、中国香港（THKU）、日本（TJU）和美国（TUSU）四种不同环境下的研究型大学为案例，进行量性和质性数据采集，质性数据以访谈为主。通过多案例的国际比较，来观察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给大学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大学的不同影响。

科研 GDP？

四所案例大学都对科研极为重视。大多数被访谈者认同科研是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核心使命。几乎所有的被访谈者都观察到他们各自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都被这个核心使命所驱动。例如，中国内地案例的王教授（化名）最近从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所长位置退休，但是仍然作为学校的荣休教授在继续工作。作为高等教育的资深科研人员，他认为“大学应该遵循自身的本质特点……是研究和探索真理的地方”。与教学和服务社会相比，他坚持认为研究是大学的第一要务。其他三个案例的资深教授也毫无例外地持有类似的观点，把科研看作是全球化时代大学使命中的第一要务。这一认识反映了大学对科研成果 GDP 的过高期待，这些期待导致了大学机构的科研化现象。

虽然本研究的参与者都观察到了科研 GDP 在他们各自大学中的重要性，但这四个大学系统的制度环境并不相同。例如，中国内地案例的被访谈者认为科研不仅仅是他们院校的使命，还是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竞争力的体现。日本的案例也展示出这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对科研 GDP 的竞争心态。中国香港

的案例同样表明，科研有助于提高大学的全球地位，以及香港转型为亚太地区甚至国际性的高教枢纽。

然而，美国的案例却给出了非常不同的答案。美国学者普遍认为，科研只是大学和学者分内的工作，跟社会乃至国家的发展并无直接的关联。换句话说，美国学者质疑“科研就是一切”的偏激式做法。

为评估而科研？

科研 GDP 的首要性以及科研成果常规性、制度化的评估给大学带来了多重压力。通过四个案例的比较，可以看出这些影响在不同系统里的诸多异同。

量性数据所示，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四所大学的教育政策学系和人类学系在科研成果的产出方面具有共同的特点。这 20 年间中国内地案例的人均科研产出最多，大约人均 2.3 篇期刊论文；日本紧随其后，约人均 2.2 篇。与此相比，中国香港和美国则存在较大的差距，分别只有 1.5 篇和 1.2 篇。从人均科研产出的绝对数量来说，四个系统中美国垫底，属于最低效的科研系统。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不论，这一发现从侧面证实中国的大学在近年来受到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的压力最大。

加入时间因素之后分析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香港是四个大学系统中人均科研产出增长最为迅速的，人均发表期刊论文的数量从 0.8 增加到 1.5，增速达到 220%。由此可见，香港的大学受到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的影响最为急迫，随后的则是中国内地和日本。比较而言，美国则再一次成为最少受到影响的大学系统。

究其原因，这可能与科研评估的常规化机制有关，如香港特区政府大学资助委员会数年一度的研究评估（RAE）、中国教育部常规的本科教学评估和一级学科评估，以及日本大学改革、支援和学位授予局（NIAD-QE）六年一度的院校评价等等。大学普遍受到的威胁是每次科研产出的评估结果与大学的年度公共预算相

挂钩。相对而言，美国的大学并不受联邦政府的约束，也没有全国性的政府评估，所以受到的压力最小。

科研国际化还是本土化？

大学对科研 GDP 的过高期待并非大学教师所受到的唯一压力。学术成果在什么样的（国内还是国际）期刊上发表也变成大学急功近利的诉求。通过研究这两类期刊论文在时间上的变化可以加深对这一现象的理解。这种变化也反映了研究型大学的一个国际性趋势——它们是如何应对由全球排名来衡量科研成果的国际竞争？

在四所研究型大学里，期刊论文的国际性语言发表和本土语言发表之间的总体比率从 1993 年的 0.17 跃升到 2013 年的 0.33，总增长率是 92.6%，其中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日本的大学贡献率是 100%。这一发现表明，东亚研究型大学科研成果的发表已经迅速向所谓以英语为主的国际期刊转移。

中国香港的大学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在过去的 20 年里，香港案例受到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的压力最为紧迫，英、汉语科研成果之间的比率从 1993 年的 1.25 跃升至 2013 年的 4.25，增幅达 3.4 倍之多。同时，总体上国际性语言和本土语言之间比率最高，达到了 1.49，远超中国内地、日本的 0.06 和 0.04。就科研成果的发表而言，香港的大学在四个系统中国际化程度最高。这一发现也间接证实香港高校科研人员具有最高的国际化水平，但就本土化而言则最低。美国案例则与香港恰恰相反，国际化程度最低，本土化程度最高。

大学正处在危机之中

——研究发现和政策启示

课题对四个大学系统的研究有如下主要发现：

发现一：中国内地大学的人均科研产出最多，日本紧随其后，美国垫底。

发现二：中国香港的大学最国际化，美国最本土化。

发现三：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香港的大学人均科研总量增速最快，中国内地和日本相若，美国最慢。

发现四：大学教员的科研化和学术生命的急剧异化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

课题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在全球化时代，大学正在经历急剧的变革。在短短的十来年里，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已经绞合成势不可当、无处不在的强大专政体制，系统地控制了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生态，越来越多的大学正不断沦陷为发表论文尤其是英语论文的量产工厂，教育和社会服务的人文功能日渐异化。美国学者大卫·珀斯特指出，科研人员的压力不断增加，但是他们的创新能力却因此而日渐萎缩。

全球大学排行榜和科研评估体系很大程度上来自新管理主义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滥用。它们极大地狭隘化了大学的传统使命，绑架了院校个性化发展的机会，粗暴地掀起了知识量产、校际攀比，甚至国际竞争运动。更有甚者，这一全球性的专政现象弱化了大学的本土性及个性，扭曲了高等教育的根本宗旨，直接导致了教学和社会服务等功能的边缘化。就国家的宏观政策和院校的发展策略而言，深切而充分地认识到这些危机是扭转这一不良趋势、促进大学本土化和个性化健康发展的紧迫任务。

（《光明日报》2016 年 8 月 23 日 作者：香港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李军）

一场持续 20 年的教育改革试验

——对我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的思考

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是一项全新的教育事业。1996 年 4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14 次会议决定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同年 6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办公室下发《关于开展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试点工作的通知》。1997 年 9 月，首批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学生入学，由此掀开了我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事业发展的序幕。20 年间，我国累计招收教育硕士研究生 30 万人，15 万余人获得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为我国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小学教师和教育管理干部。

一场全新教育事业的试点与规范

1996 年至今，我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

1996 年至 2006 年为试点阶段。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16 所高校为首批试点单位。同时，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专家指导小组成立。

在试点阶段，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专家指导小组和第一届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先后制定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参考性培养方案》《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学大纲》《关于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标准的规定》《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评估指标体系》《关于加强教育硕士的培养与管理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和专业标准，组织编写了教育硕士研究生公共课教材，开展了大量形式多样的研讨培训活动，有效完成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阶段的各项任务，为教育专业学位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

2006年至今为规范发展阶段。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决定在我国设置和试办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近10年来，教育专业学位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规模到结构，从类型到层次，从专业领域设置到人才培养模式，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基本形成了由教育硕士和教育博士两个层次构成的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建立了以师范院校为主力军、其他类型高校为生力军的院校结构，建构了全方位服务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教师培养的专业系统，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逐步健全完善，教育专业学位教育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检验这项全新教育事业的指标

我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是全新的事业，既无先例可循，也没有可以直接搬用的现成方案。20年来，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各培养院校对教育专业学位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规模快速扩大，领域稳步拓展 教育专业学位招生规模从1997年的不足200人增至2016年的29.6万人。培养院校从1996年的16所增至2014年的142所（含15所教育博士培养院校）。培养院校的扩大不仅标志着教育专业学位教育引起了更多高校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我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能力不断增强。

1997年，教育硕士招生和培养的专业领域仅有教育管理和学科教学2个专业领域、6个专业方向，从2002年起先后增设了7个专业领域和12个专业方向。到目前为止，教育硕士招生和培养的专业领域（方向）包括教育管理、学科教学、现代教育技术、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科学与技术教育、心理健康教育9个专业领域和学科教学（数学）、学科教学（语文）等12个专业方向，形成了全面覆盖基础教育不同层次、不同学科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不同专业的优质教师培养专业体系。

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稳步推进 2009年6月30日，经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办公室组织的专家组评审，并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 15 所大学被列为首批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院校。

截至 2015 年 6 月，15 所院校累计招生 959 人，已有 90 人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获得教育博士专业学位。

综合改革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 2010 年 11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批准有关高等学校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共遴选 64 所高校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其中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高校 12 所。各试点高校充分发挥学校自身办学优势，探索符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律的培养模式、质量标准、保障体系和办学管理体制。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将推进各类型教育硕士培养方案的有机整合和有效区分作为教育硕士综合改革试点的核心目标；华东师范大学紧扣课程学习、教育实践和学位论文三大培养环节，建立具有引领作用的教育标准；天津师范大学推出“4+2”学制的“本科—教育硕士”连读机制，并为此制订了“3111”培养模式，加强基础理论与应用知识相结合，突出教师教育特色；沈阳师范大学创设并逐步完善了教育硕士独立学院制管理模式；陕西师范大学实施“六个一”质量工程，全方位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西南大学针对免费师范生攻读教育硕士研究生规模大、分布广的特点，探索数字化环境下的教学方法。

培养模式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类型多、需求广、差异大，单一、固定的培养方式很难满足他们的多样化需求。此外，与全日制在校学生相比，在职攻读教育专业学位的研究生面临着突出的“工学矛盾”。

针对这一矛盾，20 年来，各培养院校在教育教学方式上开展了富有创造性的改革探索。有的院校建立了“教育硕士仿真学校”，模拟学校运行方式，为教育硕士学生提供交流研讨、模拟教学实践的平台。部分院校根据区域特点，组成了包括联谊会、委员会和学习小组等多种形式的教育硕士学生的“互助”组织，

把学习和培养工作延伸到校外，扩展到学生生活和工作单位的所在地。大多数院校都注重把教学实践经验与理论相结合，鼓励学生从中小学教育教学或教育管理的实践出发。有的培养院校尝试把学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安排在中小学进行。

实践基地建设初见成效 为了不断提高教育硕士学生的实践能力，一些培养院校通过自身努力以及与中小学的密切合作，建立了多种形式的教学科研基地，为学生提供了运用理论学习成果、提高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和技能的重要场所。部分院校选择部分管理富有特色、教学质量高、新课程改革卓有成效的中小学建立教育硕士流动站，为学生培养提供一个集教科研于一体的基地，并探究新的教育硕士培养的校本模式，提高教育硕士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也助力教育硕士指导教师的业务发展。

教育专业学位研究成果丰硕 随着教育专业学位教育的开展，教育专业学位教育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比较研究和应用研究逐渐兴起，不仅丰富了教育科学研究，而且有助于不断深化对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本质的认识，进一步推动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改革发展和质量提升。

教育专业学位教育的未来发展

树立精品意识 今后，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将进一步加大质量监控和保障的工作力度，通过研讨、培训、检查、评审、评估和优化各类标准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质量监控和保障的职能。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培养院校应加大教师队伍建设的工作力度，不断完善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任课教师和指导教师聘任制度，满足教育专业学位教育的客观需要。要进一步鼓励和支持本校参与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教师深入教育实践，提高培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聘任充足的校外兼职教师和导师；进一步加强校内任课教师和导师的业务培训。

探索培养模式革新 培养院校应发挥本校学科优势和教师专业特长，鼓励并支持广大教师主动开展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探索，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加强

对实践教学的全程管理,加大对实践基地建设的投入,切实提高实践教学的成效。今后,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将继续定期评审示范基地,并将示范基地建设纳入质量监控和评估指标体系。

重视案例研发培训 进一步推进案例教学的开展,继续组织研制教学案例编写和案例库建设基本标准,扩大案例研发的专业领域和专业方向,力争在“十三五”末实现案例教学全专业领域覆盖;并通过案例教学的研讨培训,建设一支专业化的教师队伍。

争取社会广泛支持 培养院校应努力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的需求,通过多种方式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企业建立良好和稳定的合作机制。

加快学位授权改革 在试点结束后,现有培养院校应进一步细化相关管理办法和培养质量要求,保证和不断提高教育博士质量。与此同时,积极稳妥地逐步扩大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合理布局,满足不同地区教育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要。(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教育报》2016年10月27日 作者:钟秉林)

高校科研

如何激发高校科研的“洪荒之力”?

日前,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二号太空“牵手”,展开了一批体现国际科学前沿和高新技术发展方向的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令人欣喜的是,其中多项科研成果来自高校。

科学研究是大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来自教育部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高校

牵头承担了 80% 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一大批“973”“863”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产出了一大批标志性成果，获国家科技三大奖数占获奖总数的 70% 左右……但总体来看，我国高校科研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基础研究和前沿重大研究能力不足，重大原始创新突破较少。下一步，如何提高科研创新能力，激发高校科研的“洪荒之力”，成为高校深化改革中的重要任务。

一问原始创新：

我国高校科学研究如何从“跟跑”转向“并跑”甚至“领跑”？

“当前，我国科学技术‘跟跑’和‘并行’较多、‘领跑’较少。”采访中，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徐旭东不无遗憾地说，我国 SCI 数据库科技论文数、年专利申请数位居世界前列，但与世界强国相比，在重大科学发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源头创新上远远不足。

“国家战略是鼓励创新的，但到具体部门、具体政策中，却让原始创新不时碰到一道道关卡。”北京大学人类疾病基因研究中心主任马大龙举例说，每个科研项目都要求非常详细的立项依据，然而，真正原始创新的立项依据却很难找；结题都讳言失败，但这不符合原始创新规律……他建议，梳理一些具体政策，让真正的原始创新脱颖而出。

另外，目前，不少科研项目评审根据评审专家的名望和大学科方向来组织，为了迎合更多学者，选题容易产生“热、空、大”的倾向。“因为热点、空泛和大一点的选题，得到理解的机会比较多。但事实上，越是前沿性的原始创新所知者越少，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难道要因为乏人能懂就被否决吗？”有教师质疑。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体制机制是根本。据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介绍，我国将切实加强高校创新体系和能力建设，高校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科技创新，大力提高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能力。

怎样扭转“过度国际化”导致的高校强调科研人员海外学历的“偏好”？

“国产”人才不够格，海归才有含金量。近年来，很多高校将是否具有海外

学位作为人才选拔的必备条件。在教师考核中，更是将是否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作为“金标准”。不可否认，对国际化的重视让我国学术研究与发达国家差距快速缩小，但凡事过犹不及。

“现在有‘过度国际化’的倾向，一些教师为了能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从科研的选题、技术方法、写作、投稿等环节都以国外学术刊物审稿条件为标准。”这种现象让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张正堂很是担忧，“这导致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不再关心我们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需求，而是关心国外的学术期刊偏好。”

针对这个问题，徐旭东指出，我国要有做原始创新的勇气，不必把西方科学界做没做作为立项的必备条件，而要把科学本身的逻辑和国家乃至人类的发展需求作为依据。

令人欣慰的是，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扭转评价指标过度强调教师海外学历、经历或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倾向”。很多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规定“非常有价值和及时”。

二问科研评价：

扭转唯论文、唯头衔、唯项目，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关键在哪儿？

长期以来，重数量是我国高校教师科研考核中的常见现象，比如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拿到多少个专利……但科学研究有其自身规律，往往越是重要的创新工作，周期越长。“数量导向的指标、短周期的考核，直接导致高校教师行为短期化、科研创新低端化。”张正堂表示。

其实，针对科研评价“唯论文”的弊病，早在2003年，科技部就要求“针对不同评价对象、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科学技术活动的特点，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和指标”。其后，有关部门也陆续出台了一些文件，但“唯论文”现象并没有实质改观。有专家指出，这主要因为长期以来，将论文作为评价指标已经成为思维惯性，特别是论文牵涉很多切身利益，例如高校申请重点学科、学科排名等，高水平论文都是重要指标。另外，一些顶层设计之下缺乏实施细则和保障措施，

也导致了改革难。

日前，针对唯论文、唯头衔、唯项目，重数量轻质量、急功近利的倾向，《指导意见》再敲警钟，要求扭转将科研项目与经费数量过分指标化、目标化的倾向，改变在教师职称（职务）评聘、收入分配中过度依赖和不合理使用论文、专利、项目和经费等方面的量化评价指标的做法；完善同行专家评价机制，积极探索建立以“代表性成果”和实际贡献为主要内容的评价方式；对从事基础研究的教师主要考察学术贡献、理论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对从事应用研究的教师主要考察经济社会效益和实际贡献，对科研团队实行以解决重大科研问题与合作机制为重点的整体性评价；教师科研评价周期原则上不少于3年，科研团队考核评价周期原则上不少于5年。“长周期、‘代表性成果’和分类评价的考核导向，鼓励潜心研究、长期积累，遏制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将对高校教师的科研创新产生重要影响。”张正堂表示。

目前，“疲于填表”是高校教师的常见状态，怎样提高相关管理水平？

在宝贵的科研时间中，“填表”占去了很大一部分。“现在高校里，‘善于填表’成了一种能力，有的教师科研成果重复，但可以多次被不同项目资助。”工作中，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发现了这样的“怪象”。

“同样的信息被多次填写是一个重要原因。”有专家指出，“疲于填表”背后，是不同部门的重复考核。针对这个问题，《指导意见》指出，实现学校管理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共享考核评价结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评价。

三问科研经费：

如何走出高校科研经费“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怪圈？

2014年，5所大学7名教授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2500多万元的新闻曝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乱象成为社会焦点。

河北省社科联副主席王长华对此做了调研，他发现，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科研经费预算缺乏标准和有效指导，预算编制存在盲目性、随意性；二是预算执行缺乏灵活性，对科研过程的不确定性因素考

虑较少；三是科研经费中没有充分尊重和体现智力劳动的价值。“现在，大量办公用品、交通费、餐饮费等支出项目就相当于科研人员的变相报酬，这实际上是人力成本补偿‘票据化’，根子在科研人力成本补偿不足上。”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胡卫建议，可以从项目直接成本中开支科研人员的报酬。

针对科研经费管理在“严格管理”与“激发活力”间把握平衡的问题，王长华建议，完善高校科研经费的预算管理制度，按照项目类别分别研究制定经费预算参考标准，降低项目经费预算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改革当前高校科研经费的配置机制，让科研劳动价值得到充分体现；深化高校科研人员薪酬制度改革，从制度上保证科研劳动的价值体现。

如何破解“科技管理行政化”？

“别让教授在报销人员面前像孙子！”日前，周志强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话糙理不糙，一句话，道出了“科技管理行政化”的有苦难言。“行政管理人员本应该是服务于科学研究的，却因为一些‘领导式管理’思想，造成了管理的比科研的高一等的现象”。周志强说。

“科技管理行政化”不仅压抑创新，把科研成果当成政绩来追求，也客观上助长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有专家指出，要破解“科技管理行政化”，必须从改革科研管理的源头入手，这也成为下一步高校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任务。

（《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9日 作者：张烁）

大学应重构科研与教学关系

教学与科研，是现代大学的两大基本职能。从理论上讲，二者应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有机统一于大学教师的职业活动之中，但实际上它们却经常表现为对立。关于二者的关系人们争论已久，国内外相关著述不计其数，但至今仍未

有定论。

20世纪50年代，围绕这个问题，我国教育界也曾经引发过一场大的争论。到70年代末，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认为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一个教师的水平应该体现在既能搞科研，又能搞教学。钱伟长院士曾经说过：“你不教课，就不是教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教师。”

不过，20世纪后期，由于教师们承担了过多的科研任务，教学受到了挤压。尤其是近年来，在高校的职称评聘、考核评价等工作中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教学在大学中的地位被弱化，有的教师把教学任务当成了额外负担，不愿意在教学上投入时间和精力，对上课敷衍了事。这个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主张高等教育应该更加注重教学的呼声似乎越来越高。

改变职称评定主要与科研挂钩的倾向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发挥考核评价政策的“指挥棒”作用，健全教学激励约束机制，克服教学成果难以量化评价的困境，改变职称评定主要与科研挂钩的倾向，提高教师教学业绩在绩效分配、职称评聘、岗位晋级考核中的比重，充分调动教师投身于教学的积极性。

今天大学的改革当然应该正视存在的问题、回应社会的呼声，重新审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作为一个教师，首先要搞好教学。是否重视教学反映了一个教师对自身所从事职业的态度。现代大学作为教学机构，应以教学为中心。教学是大学教师的基本职业取向，重视教学是教师职业伦理规范的要求。

现代大学作为知识组织和学术机构，还担负着生产和创造知识的重要使命，这必然要强化科研，科研职能是大学的根本价值所在。重视教学并不意味着忽视科研，恰恰相反，要做好教学就一定要搞好科研。能否取得以及取得怎样的科研成果反映了一个教师的学术水平的高低，进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认识问题和解

决问题所能达到的高度。所以，一个教师的能力往往被认为是由科研决定的。

19世纪初，德国的教育改革家洪堡提出，大学教学必须与科研相结合，大学教师只有在教学活动中不断纳入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成果，其教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学。

美国当代学者伯顿·克拉克曾说过：“现代大学教育中，没有任何问题比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更为根本，也没有任何问题在学术界内外有如此肤浅的想法和倒退性的批评。”的确，我们需要对那些以重视教学为名而忽视科研的论调要保持警惕。

但是，正如笔者前面所述，高校教师进行科研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搞好教学。在这一点上，不能本末倒置。

教师做科研能帮助学生成为创新型人才

大学教师在其特定的专业领域成为具有原创性的思想者和研究者，能够帮助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养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帮助学生获取隐藏在各种知识背后的智慧，引导学生展开对可能性的想象，获得意想不到的洞见；培养思考、分析和探求真理的综合能力，成为创新型人才。

首先，大学教师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早在20世纪60年代，哲学家罗素就指出，学习并不是一个传播知识的过程。著名学府之所以成为学生们的目标，是因为这里有创造知识的大师。大学的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传授知识的层次，还要拓展到更高的层次，正如我国学者刘献君等所总结的，教师要“展示理论如何用于实践、开启学生对概念及其之间相互关系的感知”，还要“从不同的视角探索理解方式、改变学生的思想认识等”。要做到这一点，教师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几十年前，拥有一定自然科学或

社会科学知识的人都被视为人才,都可在知识普遍缺乏的社会中发挥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单纯拥有知识并不能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社会需要的是勇于迎接挑战的创新型人才。因此,为社会输送创新型人才成为当代大学的使命。这就给教师的教学乃至教师的能力结构和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教师的科研对于学生的创新能力具有教育价值,教师所从事的科研大多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多着眼于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就是学科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学科本身完善化的需要。应用研究多着眼于现实的社会需要,包括经济发展的需要、资源的需要、环境的需要、医疗卫生的需要以及文化的需要等。科研的过程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是对许多基础问题认识深化的过程。

如果教师不做科研,就不会有解决问题的体验,对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就难以达到应有的高度和深度,即使投入再多的时间、再多的精力恐怕也难以达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要求。

最后,重视科研在大学教学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是适应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提升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必须是研究型大学,以研究作为自己最突出的特点。我国已经明确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不可避免要以科研水平作为重要依托,要生产出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因此,要大力提升大学的科学研究水平,切不可将科研与教学对立起来。以重视教学为名而忽视科研,不但搞不好教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恐怕也将拉大。

因此,大学的改革要重构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重视科研在大学教学中的基础性作用,使“教学为要,科研为基”成为大学教师职业活动的基本原则。(作者系山东科技大学教授、教育部社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光明日报》2016年10月28日 作者:王耀东)

师范院校怎么“突围”

师范院校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的历史命运上多有“劫难”，不是被“改名”，就是被“吞并”，但也有不“改名”不被“吞并”的“坚守者”，他们既坚持“师范”办学特色，又寻求为社会经济服务。

所谓师范院校发展的“突围”，是指打破传统仅以教师培养为目标的一元办学模式，通过赋予师范学科和专业方向新的内涵和增加新的学科专业方向，形成可与综合院校比肩的办学特色。台湾师大的“跨越整合、为师为范之综合型大学”办学目标定位，台湾高雄师大从原来的师范学科和专业方向扩大到绿色能源、光电等学科，浙江师范大学建立“非洲研究院”等，都说明了师范院校发展的“突围”努力。

问题在于师范院校发展为什么要“突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大陆和台湾的师范院校都面临着高等院校之间的激烈竞争、自身办学经费紧张、生源质量下降、毕业生就业困难等的巨大压力。师范院校的领导者们都深感师范院校发展的困境。对于大陆师范院校来说，高校扩招、“211”和“985”高校工程项目、大学排名等诸多因素导致师范院校追求大而全，不得不在激烈的大学竞争中寻求“突围”。台湾的“少子化”导致大学生源减少，如果不“突围”就面临关门风险，同时对于师范院校而言，台湾高校师范生因为“少子化”而面临就业难。而台湾师范院校在这种生源减少背景下更因1994年出台的《师资培育法》而危机四伏，师范院校合并导致“师范”不存，这就迫使台湾师范院校“突围”。

有意思的是，这些师范院校发展“突围”采取了两种“增量”策略，一是增加非师范的学科和专业，二是增加师范专业的非师范“方向”。前者主要以文理学科为主的师范学科和专业扩大为文、理、工、农、医、法、经、管、艺、军等学科专业；后者就师范专业的方向，从师范专业向满足社会不同领域需要的专业方向扩大，如将中文扩大到编辑、文创、艺文等，使传统师范学科和专业可以满

足除中小学校以外的出版社、报社、政府、企业公司等需要。但不管如何“突围”，师范院校“初心”不改，始终坚持“做强做特”教师教育，尽管这种“突围”还要面对师范院校内部的挑战。

当前，教师培养体系正从一个封闭的体系向一个开放的体系转型，从师范院校一元垄断向多元开放转型。这种转型导致的负面影响既表现在生源质量下降，又表现在院校之间生源竞争，而生源竞争又受到毕业生就业的供需矛盾困扰。如果就单纯的供需关系来看，大陆和台湾都存在同样的状况，那就是教师的培养量远大于教师的需求量。据统计，2014年全国教师资格获得者25岁年龄及以下的人数为101.06万人，意味着这些人有条件到学校就业，但普通小学、初中、高中、中职、特殊教育和普通高校分别录用毕业生16.50万人、8.23万人、4.99万人、1.66万人、1563人、5.38万人。为此，师范院校开始实施免费师范生的招生政策或优厚的奖学金制度。

从大陆来讲，师范院校发展的“突围”，还与教师资格的国家统一考试制度实施有关，因为这项制度使教师的来源多样化。从传统上师范院校以毕业证书和学历文凭证书作为任教依据，到教师资格地方考试制度，再到教师资格国家统一考试制度，反映了教师来源的多渠道性。为此，师范院校作为教师教育体系的主体，在融入到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中去的时候，更要有追求质量提升、特色办学、优势发挥的目标。首先，师范院校应将教师教育确定为办学特色，不能放弃。其次，师范院校要做强教师教育，做强其实就是提高培养质量，减少师范生招生数量，提高培养质量。再其次，师范院校要做特教师教育，做特就是把教师教育做成师范院校的特色学科和专业方向。

在一个师范院校办学实质上综合化了的背景下，教师培养质量如何保障和提高？培养质量首先在生源质量上，不仅要保证基准线，还要保证对教师专业的认同感，更要吸引优秀学生，为此采取免费师范生培养政策。其次要提出高质量的培养目标，如台湾的“创意教师”，大陆的“卓越教师”、“高质量教师”等。无论怎样的目标，大陆和台湾都十分重视“师德”和“师道”培养。再其次是制

定专业标准,教师知识、教师能力和教师伦理成为理解教师专业标准“金科玉律”。台湾强调教学教法能力、带班能力、辅导能力以及中英文沟通交流能力的培养,大陆则探索创新培养路径,包括学制延长、创新实验区建设、顶岗实习、案例教学等,同时强化实践教学,强调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既把中小学教师请到大学讲台,也把师范生派到中小学校。

教师教育体系直接决定了教师培养的起始、过程和结果质量。无论是做强还是做特,师范院校最终都要追求高质量的教师培养,无论是单一独立的教师教育体系,还是多种类型的院校构成的教师教育体系,如果没有保障高质量的教师培养体系,都无法证明教师教育体系是高质量的。

(《中国教育报》2016年11月8日 作者: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朱旭东)

师范院校转型发展探索：教师教育是师范院校的根

对当前师范院校发展困境,岭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罗海鸥深有感触。近年来,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自2008年开始急剧下降,直至2014年起开始止跌趋稳。再加上师资培育多元化的冲击,产业转型升级对理工科人才需求量大增,近年来师范院校发展面临重重挑战。

师资培育多元化是大势所趋

上世纪90年代,大陆逐步走上了师资培育多元开放之路。1999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鼓励综合性高等学校和非师范类高等学校参与培养、培训中小学教师,探索在有条件的综合性高等学校中试办师范学院。

今年,岭南师院英语教育专业毕业生林良宝参加教师招聘时发现,与她竞争的不仅有师范院校毕业生,还有很多来自如华南理工大学等非师范类院校毕业

生。部分中小学更倾向于招聘综合性大学毕业生。

“师资培育多元化是大势所趋，也是发展所需。师范院校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师范生培养质量如何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要求。”海南师范大学校长林强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相比曾经，当前师范院校生源质量在下降。报考师范院校的部分学生不但成绩和能力不在一流学生之列，也未把教师作为理想，而是当成谋生的职业。

师范院校舍弃教师教育是舍本逐末

罗海鸥认为，师范院校应防范在多重困境下迷失办学定位，在转型发展过程中追求高大上，陷入无特色、无学科优势的同质化发展误区，在低层次发展中打转。

“教师教育是师范院校的‘传家宝’，不能完全舍弃。”罗海鸥将教师教育视为师范院校最主要的优势、特色。

“如果一所师范院校完全将教师教育舍弃，盲目跟风去办理工科大学或综合性大学，无疑是舍本逐末，很容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罗海鸥分析说，大陆教师教育已从“数量扩张型”转向“质量优化型”，师范院校更要固本培元，将教师教育进一步做优做强做特。

近年来，海南师大也着力加强师范生师道培养，该校不但鼓励师范生多读书，通过经典案例去激励学生，同时还组织师范生到偏远地区中小学校顶岗实习，到敬老院等机构献爱心。

“为培育出卓越教师，上海师范大学从入口处开始行动。”上海师大前校长张民选介绍说，该校在录取之前，先面试报考学生。通过板书、小组讨论、讲解问题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综合能力等，从中选拔出有兴趣、有能力当教师的学生。

入校后，上海师大着力强化师范生教什么和怎么教的核心能力。要求师范生在实习时，强调精细化和问题导向，以真正了解教学第一线，知道教学中会出现

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例如在跟家长谈话时知道应该说什么以及怎么说。

为防止师范生供过于求，张民选强调说，师范院校要与政府相关部门做好调研规划，在摸清学校师范生来源地、毕业后就业地和就业学段以及就业地教师需求后，再根据人口出生率以及人口流动趋势，精确制定师范生招生计划。上海师大调研发现，该校本科层次师范生40%的生源来自上海，60%的毕业生留在上海工作。留在上海的，就业学段为学前、小学、初中的各占三分之一。

上海师大从上海市教委等部门获悉，近年来，上海市每年新补充3000多名中小学教师。由于上海市希望师资来源多元化，不愿一所学校培养的教师占比太高，因此该校每年新招1000多名师范生，正好满足需求。

为让培养的中小学教师更“接地气”，适应九年一贯制学校建设，林强介绍说，海南师大将中小学名师请上该校讲台，并积极破解师范生不甚了解初中、小学教学的问题。为提升生源质量，该校积极利用免费师范生政策。今年，海南师范大学招200名免费师范生。起初，林强还担心招不满。但报名情况火爆，上千人填报志愿，部分考生成绩远高于海南省一本线。

师资培育新需求蕴含发展新机遇

师资培育的新需求蕴含着新的发展机会。国家和社会对特殊教育越来越重视，但内地特殊教育教师严重匮乏。2012年，岭南师院特殊教育专业因需而生。该校为推动高起点办学，诚邀台湾特殊教育界专家吴武典担任专业负责人。同时，岭南师院还邀请台湾师大等台湾高校特殊教育专家来校授课，并派该校特殊教育教师前往台师大等高校攻读博士。岭南师院特殊教育专业还采用“3.5+0.5”的培养模式，学生三年半在该校学习，半年赴台中教育大学等高校研修。

“我校特殊教育专业学生取得良好的培育效果。”罗海鸥介绍说，该专业首届本科生获得了广东省“挑战杯”特等奖，毕业后出路都较好。除5名学生被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录取为研究生外，其他学生都被特殊教育学校一抢而空。

“师范院校在调整专业时，一定要调研清楚主要依托区域的未来人才发展需

求，布局新专业时，一定要找准自身优势学科基础和所在区域经济社会急需人才的结合点，投入大量人财物重点扶持。布局的专业怎样发展，还要考虑该专业在本地高校中的地位，找准自己的细分市场。”张民选说。

张民选认为，师范院校也可在人文学科中寻找“新大陆”。他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为例说，该院成立于2007年，是中国高校首个综合性实体性的非洲研究院。经过8年建设，该院已是国内高校首个拥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非洲研究”岗位的学术机构。岭南师院也于近日新建了亚洲潜水学院，实现了差异化发展。

（《中国教育报》2016年11月8日 作者：刘盾）

社会服务

三问高校社会服务：大学如何走出“象牙塔”

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日前落下帷幕，不少参赛项目引起了行业企业、创投风投机构的兴趣，可能会在将来得到广泛应用。

作为人才和科研的高地，服务社会是大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大学如何真正走出“象牙塔”，与社会实现全方位对接？这是高等教育改革必须交出的答卷。

一问前提条件

大学办学定位是否明确清晰？

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学校，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上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本以上的大学，不少是研究型高校；二本、三本院校盲目效仿，一窝蜂往综合性大学这条路上挤；应用型高校缺乏发展空间，高水平应用人才严重短缺……求

大求全、定位不准、缺乏特色、千校一面，是高校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社会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大学要更好地服务社会，就必须改变同质化趋势。在这方面，国外经验值得借鉴。比如美国的一流高校特色鲜明、风格迥异，既有研究型大学，也有应用型大学，还有如纽约时装学院、美国烹饪学院等专门学院，都培养出了大批人才。

在当前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中，引导高校明确自身定位，分清层次类型，办出特色水平，服务经济社会至关重要。怎样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怎样建成一批有特色高水平应用型地方高校；怎样建立健全高校分类指导、分类拨款、分类评估制度……都是推动高校合理定位、特色发展需要思考的问题。

大学培养的人才是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高校服务社会，最根本的是人才培养。但我们现在培养的人，往往存在着“高不成、低不就”的问题。从“高”的方面看，当今大学生对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关注不够，对科技创新有些乏力，对社会发展变革缺乏深刻认识。从“低”的方面看，部分学生眼高手低，实践技能低，工作能力差，小事也做不好。如何通过教育引导向应用型发展，达到服务社会的目的，是高等教育需要应对的挑战。

“如果通过大学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激发创新意识、造就创业本领，能够激励和引导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发展自己，那么未来他们必能成为有批判性思维和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建设者。”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郑晓静说。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要走的路还很长：比如推动教学内容、方法的改革，注重实践，加强高校与产业、行业、企业深度合作；优化人才培养类型，提高应用型、技术型人才的培养比重；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服务战略新兴产业、重大民生急需等。

二问科研转化

科研成果与社会需求为何容易“两张皮”？

一边是大量科技成果“睡大觉”，一边是渴望新技术的企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如此情形，并不罕见，正折射出当前科技成果与社会需求“两张皮”的脱节现象。

高校科研成果只有在生产中实现了转化，才能真正发挥出创新引领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但事实上，很多高校科研在立项时就出现很多问题，比如选题不够“接地气”、市场定位不明确、考核指标不清晰等，导致项目成果大多停留在纸面上，自然也产生不了经济和社会效益。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高校科研应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具体说来，就是要求高校加大应用技术研究，要把科研重点放在关乎国家发展战略、关乎人民切身利益、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项目上来。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认为，要实现科研成果和社会需求的对接，关键要走好两步：第一步是应用型研究要注重选题的贴近需求；第二步是技术研发出来后，要与产业进行深度的合作研发。

怎样破解科技成果转化率的难题？

“从样本到展品，最后成为废品”，对于高校科研成果，这样的说法或许略显夸张，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高校科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的困境。目前，我国高校在论文数量、专利数量方面有了大幅度提升，但科技成果转化率这一指标却一直处在较低水平。数据显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而先进国家这一指标在60%至70%左右。

解决科研成果转化中的“肠梗阻”，关键在于调整“指挥棒”。长期以来，高校的考核评价体系往往“以论文论英雄”，重课题、重论文，轻应用、轻转化。在这样的导向下，许多科研人员倾向于选择容易发论文的课题，而并不在意立项能否实现后期转化。加之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自然更是没人愿意用心于此。所以，调整科研评价标准，激发高校科研人员创新活力，是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国家打出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组合拳”：去年，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正式实施；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印发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若干规定，国办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在下放科技成果转化处置权、科技成果收益留归科研单位、大幅提高科研人员的奖励比例等措施下，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障碍正在逐步破除。

三问智库建设

如何拧干智库发展中的“水分”？

随着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推进计划的逐步实施，高校智库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新时代：创办《高校智库专刊》和“中国大学智库论坛”、设立首批42个国别和区域的研究培育基地、累计提交咨询报告4万余篇……然而，在喜人的形势之下，高校智库也存在着一些“水分”，真正有分量、有影响的智库还很少。

“看到中央对于智库发展建设的重视之后，似乎在一夜之间，涌现出了众多的智库。一些智库评估机构也纷纷兴起，在还没搞清楚智库的战略定位、运行模式、治理结构的前提下就开始盲目排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高校智库与一般性大学之间是有区别的，“如果图一时热闹，混淆了基础研究和政策对策研究之间的区别，把所有高校都变成智库，那将是智库建设的悲剧。”

专家们认为，在智库建设中，百花齐放固然好，但朵朵鲜花还需有特色。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智库应当有明确的自身定位，警惕乱贴标签、一哄而上、只做表面文章的现象。只有站在国家发展的全局，潜心研究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核心和瓶颈问题，高校智库才能发挥自身优势，为政府提供专业客观、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如何实现“庙堂”与“江湖”之间的有效对接？

学者们指出，作为国家“智囊团”，高校智库要想真正为改革和发展凝聚力量，提供高质量的咨政服务，其中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一环，就是如何将“智力”优势转化为“治理”效果，实现“庙堂”与“江湖”之间的有效对接。要实现这

样的对接，首先要厘清高校智库的特点。一方面，智库研究不同于纯学术，不能一味依赖逻辑思辨，纠缠理论学理，而是要“接地气”，牢牢把握中国国情和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智库研究不同于商业化项目，必须站在服务国家决策的高度想国家之所想，绝不能成为个别利益集团代言人。

要让政府对高校智库“信得过、用得上、想得起、离不开”，关键是要坚持问题导向。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创始人王荣华认为，智库研究的问题必须是“真问题”，是党和政府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是人民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而这种“真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靠的是沉下身子、实践调研，然后进行系统性的思考，最后才能提出具战略性、宏观性与前瞻性的决策建议。

（《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日 作者：丁雅诵）

政策解读

允许高校教师兼职 新政策将给高校带来什么变化

一记“重磅炸弹”引发万千科研人员、高校教师的刷屏——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一时间，“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允许高校教师从事多点教学获得合法收入”的消息迅速被传播。

《意见》旨在“充分发挥收入分配政策的激励导向作用，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对高校及高校教师意味着什么？这一政策导向的现实针对性是什么？人才创新活力得到极大激发后，将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哪些影响？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马陆亭、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李立国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陈超，解读政策要点，回应公众关切。

拓宽了教师收入的合法性来源

记者：《意见》中最值得关注的亮点有哪些？对高校和高校教师意味着什么？

陈超：《意见》将知识、科研工作和科研成果的价值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的亮点主要有：首次明确将产权和股权与教师的科研收入联系起来，实则是将教师的科研成果当作知识资本，从而肯定了教师的收入可以包括基础性工资、绩效奖励、由科研成果和知识资本带来的资本性收入等多个方面，从而拓宽了教师收入的合法性来源，这对于激发教师的科研创新热情，改善高校教师的收入水平，稳定高校教师队伍具有积极意义。

《意见》明确鼓励教师可以开展兼职工作，并取得相应收入，对于解放教师的生产力和活力具有现实意义。《意见》明确提出要发挥财政科研项目资金在知识价值分配中的激励作用，建立健全符合自身特点的劳务费、间接经费管理方式，合理安排间接经费中绩效支出，这对于劳务费的使用范围、使用方式和使用方向是一个新的信号。过去，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规定大都禁止科研项目主持人、有工资收入的科研人员领取劳务费，劳务费只限于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科研助理、兼职人员和外聘人员。《意见》突破了过去的常规，取消了劳务费比例限制，扩大了劳务费的支出范围，提升了劳务费的激励作用。

李立国：对教师而言，兼职取酬是利好消息，可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激发教师积极性，通过更多的劳动报酬，提升收入水平，实现知识的价值；对高校而言，亮点在于带来更多的收入分配自主权，打破传统的分配体制，真正实现按劳动价值分配。

鼓励教师参与社会服务

记者：这一政策主要针对的是现实中的哪些问题？

陈超：这一政策主要针对当前高校教师收入水平整体偏低，工资收入来源单一，工资合法性渠道模糊；科研经费管理规定不合理；项目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劳务费设置不合理，没有有效发挥激励作用；科研成果产权意识薄弱，产权保护滞后等问题。

李立国：必须强调的是，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对教师校外兼职取酬的争议较大，国家也未出台相应政策。而社会需要大学教师的智力支持，产学研合作也需要大学教师的积极参与，因此，此项政策出台不仅是鼓励教师依托智力和知识参与社会服务，同时也是对教师参与校外社会兼职取酬问题的回应。

记者：意见提出分类施策，赋予高校更多收入分配自主权等原则要求，对于正在进行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既是政策利好，是否也是一种挑战？在操作过程中需要破解哪些难题？

马陆亭：分类施策赋予高校更多收入分配自主权，让高校有了更多的政策空间和自主权利，也有了更大的改革灵活性去推动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特别是薪酬制度改革。但是，如何规范校外兼职取酬、如何平衡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与兼职的关系，需要各高校因地制宜，在管理匹配上下足功夫，通过不断调整、完善形成更加规范和具有操作性的管理规定。

警惕教学科研、校外兼职与科研转化的失衡

记者：人才的创新活力得到极大激发，将给整个高等教育带来哪些影响？

马陆亭：通过种种举措激发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更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以及产学研合作，避免过去教师科研成果“睡大觉”等情况的发生。最重要的是，这也鼓励他们走入社会，履行社会服务职能，解决社会问题，从而直接推动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

陈超：毫无疑问，这项政策短期内将会激发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但需要警惕的是，从长远来看，如果教师把更多精力和时间投入科研转化和外部兼职之中，不可能不对其教学科研等本职工作造成影响。要防止“科研第一、资本第一、产权第一、股权第一”等思想扭曲高等教育基本理念和核心使命。

（《光明日报》2016年11月10日 作者：晋浩天 高文豪）

仪规消退 教育何存？

人们对教育的敬畏心与神圣感，一定程度上与庄严教育的仪式紧密相连。当下，教育仪式与仪规迅速弱化已成不争的事实。杜威认为，教育的过程就是教育的目的。而今，以尽可能少的付出获得尽可能多的证件似乎正在取代谆谆教化的过程而成为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

一项调研表明，学生认为虽然进入了理想的大学，但从一开始就找不到归属感和认同感，想象中隆重的开学典礼，变成在教室通过同步视频观看领导的讲话；在四年的学习进程中既缺少温度感，更缺少存在感；好不容易熬到毕业典礼，各班级仅派一两名代表参加大会领回所有毕业证，然后分发或邮寄给其他未能到场的同学。另一项调查显示，八成受访者认为，没有参加“毕业生代表大会”不是一种遗憾，四成参加过毕业典礼的受访者则表示，毕业环节中唯一记忆深刻的就是合影，其他形式化的程序并没有纪念价值。

随着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普及化进程的加快，再大的会堂典礼也难兼容所有的新生或毕业生；而通过现代化信息手段，学校可以轻易通过在线转播于同一时段完成对所有学生的仪式教育，传播效率极其显著。然而，仪式仪规教育绝不等同于知识传授，其关键在于触及学生心灵的在场情景，这种教育所激发的感受不可替代。眼下，学生对大学的敬畏心逐渐淡漠，封建教育习俗被摒弃，平等教育观念得以普及，传统仪式先后被削减，求学问道再也无须秉持拜师叩首等复杂的礼仪，尊师重道已沦为谈资。与此相应，教育的文化传承意蕴在消解，大学不再充满威严神圣，向往和憧憬已然消失。

拜师是古代中国教育中至关重要的仪式。西周即有“释菜礼”，唐代不乏“束修礼”，均为约定俗成的教育仪规。《礼记》有云：拜者，服也。“拜”就是一种仪式达成某种关系，师承关系通过一拜而成。师道尊严，尊师重道，是学习

传统技艺的头等大事，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环节。“入泮官，出府学，上青云路”，古之学子，概莫能外。其间，既富于传统讲求的师承，也饱含文脉相承的精神。教育的传统仪规是社会伦理道德获得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依据，文明文化由此生成。

在国外，教育仪式也十分讲究。例如，毕业着装的规矩，学位授予和毕业仪式等一系列服侍及其相关活动不仅具有历史感和神秘感，而且投射出鲜明社会使命感和神圣感。哈斯金斯教授在《大学的兴起》一书中谈到，学位授予仪式是早期大学各种仪式中最重要的一种，中世纪学生必须经历的洗礼，学生在授予学位时须佩戴指环或行接吻礼。作为一种经典仪式，学位授予的各个程序安排和环节设计成为了表现大学特征和文化的典型体系，大学精神和传统通过一系列象征性活动组合而成。

仪式教育是有关集体记忆、文化传承、知识传授与人文素养的教育，集中体现了学校的文化特征，是学生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激励的重要参照系，蕴含精神力量，导向健康积极。例如入学仪式，作为迈进高等学府的第一篇章，其原型源自一种人生仪礼，是“开始”的象征，代表新生身份的转变，以庄重的情境展示使受教育者产生认同感、归属感和使命感。人文精神、校园文化、管理制度、行为规范，通过仪式仪规得以固化并传承。庄严的仪式润物无声，是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源泉。涂尔干指出：“仪式首先是社会群体定期重新巩固自身的手段。”同时，教育仪式提供了强有力的心理暗示，是强化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的有效教育方式，能激发和满足人们的求知欲望和拥有知识的神圣心理。

必要的仪式既是对教育生活的诠释，也是对教育生活的超越，其独特的人文魅力使教育本身更具感染力。现在的问题不是“得意忘形”，而恰恰是“既未得形，又忘了真意”，教育过程中残存的仪式仪规形同虚设，其中一些则徒有其表，形式奢华而实施草率，学生的内心情感了无皈依。

如果在毕业时节缺少相拥而泣的惜别，在离开校园时如释重负且不愿回首，教育的意义何存？

《中国教育报》2016年11月21日第5版作者：董云川 代斌）

未来教育范式在青年手中

2013年10月10日，清华发起建立全球第一个中文慕课平台——学堂在线，致力于以互联网技术探索解决中国乃至更大范围的教育问题。短短3年，目前清华慕课有196门，位列全球大学头名，而学堂在线有来自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600万的注册用户。沿这个方向走下去，应该是要聚集更多的资源、更多课程上线，推动更多教师使用慕课，并与翻转课堂结合实践混合式教学，更多些保质保量的混合式学习学位项目。

但我认为这还不够。目前主流的互联网+教育的主攻方向是“效率导向”，主要聚焦在知识传授上，学习成效的提升主要寄托在了旧有的课堂形式的互联网化平移。但大学功能显然不只包括知识传授这一条。下一步，必须思考和探求新的范式，即在教育理念上升级迭代。

有人说，互联网不擅长的，是传授那些非知识、非课程的内容，这就注定了校园生活在大学教育中的不可替代性。也因此，甚至有人预测在未来的大学教育中，“硬内容”的部分以课程为主，互联网占据上风；而大学应更多强化“育人”方面的优势，以人际体验来延续大学的生命。但我们大胆设想一下，随着AI和VR等技术的迅速发展，随着互联网原住民成为学习的主体，随着虚拟社群的舒适度开始追赶现实社群，那些“生活体验”、面对面的互动，真的不是互联网的胜场吗？真的还能区分出线上和线下的重大分别吗？

那么，什么时候发生这个“范式转移”？我想，会越来越快了，不仅是基于技术的变革，也包括社会认知的演进。已经有一些公司在招聘时公开强调不再看文凭学位，也有互联网教育平台更着重于新学习习惯的养成，重视学习者沉浸体验的虚拟学习环境的平台也出现了。

更应关注的是，谁来推动这个“范式转移”？希望正是寄托在那些网络原住民身上。他们未被传统的教育模式固化头脑，天生就以网络精神为自然而然、以互联网与生活的融合为自然而然。这些青年，不把习惯当自然，是敢于挑战教育难点、学习痛点并打造成长支点的青年一代。

只有这些网络原住民青年，才能从质上而非量上、从范式上而非效率上，给在线教育乃至教育，带来新生。

“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未来会怎样，就看你的选择和行动。

（《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1日作者：杨斌）

发送范围：校领导、学校中层领导干部

淮阴师范学院发展规划处、高教研究中心联系方式：

网 址：<http://www.ghc.edu.cn>

办公地点：办公楼 6 号楼 101 室、102 室

联系电话：刘爱东 83525996 葛 军 83525596

皮 武 83525568 潘 浩 83525569
